

是人物研究 还是反共宣传?

——评司马璐的《瞿秋白传》

王关兴

一九六二年十月，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司马璐撰写的《瞿秋白传》。该书装帧为黑色封面，封面的瞿秋白像和书名均为黄色，三十二开本，共一六一页，正文约六万余字。全书除序言和附录（《多余的话》）外，分为八章。第一章“出生·家世”；第二章“从北京到莫斯科”；第三章“参加共产党前后”；第四章“恋爱与结婚”；第五章“‘八七’会议的前后”；第六章“‘左联’鲁迅”；第七章“进入苏区与被捕枪决”；第八章“瞿秋白一生的总结”。

作者司马璐，又名马义。一九一九年生于江苏泰州，一九三七年六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被派往皖南、浙西开展秘密工作，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特务分子蔡力行组织“中国人民党”，发行《人民周报》，进行反共宣传。一九四八年又在上海创办特务外围组织——“大江通讯社”，自任社长，不久又拼凑成立“和平民主同盟”，继续反共，失败后逃往香港。一九五二年写了《斗争十八年》一书，并办了“亚洲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九月开办《自联通讯》，任社长，在此期间，多次参与反共反华活动。其主要著作除《瞿秋白传》外，还有《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斗争十八年》、《中国和平演变论》、《中国问题论集》等等。

《瞿秋白传》在香港出版后，为一些高校和图书馆所订购，读者虽少，但有一定影响。所以必须对该书所散布的反动观点和被歪曲的史实，予以批判和澄清。

司马璐在序言中说：“笔者在写本书时，态度力持客观、忠实、不动感情、不存偏见。”^①但是“拜读”以后，觉得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反革命的“偏见”，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感情”，“忠实”于他反共的一贯立场，用唯心主义的主观推测来取代客观事实。这是一本观点反动，内容荒诞，严重歪曲历史的作品。

作者抛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今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者，还继续在亚非许多国家，选择与制造瞿秋白型的知识分子，瞿秋白死了，他死得那么不值，但却有一个好处，把它真实的故事写出，对全世界的亲共或左翼的青年知识分子，富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什么“积极的教育意义”！无非是通过被严重扭曲了的瞿秋白的形象来说明共产主义运动“是悲剧”，瞿秋白参加共产党“是悲剧”，瞿秋白演的“是悲剧”，“他是一位历史大悲剧的主角”而已，妄图使一些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有为进步青年向右转，跟着他反共。可是，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位“悲剧”的执笔者，司马璐所诅咒的“历史悲剧”已成了人间的喜剧，瞿秋白生前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人间化”的伟大理想，已在中国初步实现。

① 司马璐：《瞿秋白传》第2页，* 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的，不再注。

司马璐在该书的第二、第三章中，对瞿秋白于一九二〇年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进行采访的动机、目的和成就作了完全歪曲的描绘。他说：瞿秋白去莫斯科“是不得已的”，抱着“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在国内走投无路”，以“永告决别”的心情去“准备一死的”。瞿秋白“一心要出类拔萃”，要满足“当傀儡领袖”的“出头”“欲望”。在司马璐的笔下，瞿秋白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亡命之徒”。这是对瞿秋白的莫大侮辱！是对中国历史明目张胆的篡改！

偏见往往比无知走得更远。众所周知，瞿秋白一九二〇年赴苏俄考察是有他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触醒了”瞿秋白“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①。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瞿秋白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尽力于社会改造”的目标。他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②，并批判了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思想，赞成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极强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改造”^③。一九二〇年十月，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他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对社会主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瞿秋白说，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这阴沉沉，黑魃魃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④，因之，就唤起了这个“我”心中朦胧的革命意识的觉醒，“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儿，他变成了一个‘阴影’，朝朝暮暮的守着我”^⑤。正由于这个“阴影”在前面引“我”，“我”才决定到正处在冰天雪地饥寒交迫的俄国去。“我”之所以去俄国，一方面是为了“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更主要的则是为了给中国谋求新的生路”，是因为“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因此才“决然就走！”显然，秋白赴苏俄的“内的要求”，决不是司马璐胡说的“要出头”的欲望，“准备一死”的“冒险心理”，而是要摆脱在国内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的“朦胧状态”，其目的是为中国“谋求新的生路”，“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这些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犹如金子一般，在瞿秋白的遗文中闪闪发光，可是，司马璐对此视而不见，相反，炮制种种谎言，欺骗舆论，这难道是“客观”的吗？

司马璐说：瞿秋白赴苏俄时，因为是“准备一死”的，所以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凄凉的”，“带着苦闷”。真是荒谬到了极点。瞿秋白是怀着对于十月革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前往俄国的。他记载一路上的心情是：“车轮雷辘，鼓动热烈的声浪，血气奋张，含着不定的希望，舞手蹈足似的前往”^⑥。在莫斯科，他看到了“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使他“内的要求”获得真正的满足。因此瞿秋白把这段历史称之为“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瞿秋白赴苏俄时，其目的是端正的，其心情是愉快的，但是当时的苏俄正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干涉，国内的武装叛乱纷起，经济困难，人民生活非常贫苦，在这种形势下去考察，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甚至有可能随时牺牲生命，对此，瞿秋白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页。

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

③见《新社会旬刊》，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④同一，第4页。

⑤同一，第3页。

⑥《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83页。

备的。他说他当时为着“向自由门去，不免起种种想象”^①，“兴兴然而去看‘新奇’，也许不幸奄奄然而就死”。他在莫斯科虽然觉得“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②，但心中还怀着疑问的感到“饿乡！饿乡！你还是磨炼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工作开始了，看着吧！”^③不难看出，瞿秋白在这里所说“奄奄然而就死”，决不是司马璐歪曲了的意思，相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为“向着自由门去”探索真理而随时准备经受磨炼甚至牺牲的高尚情操。

司马璐说，瞿秋白在苏俄期间，由于“充满悲观、失望与颓丧的情绪”，因而给《晨报》所写的通讯内容中，“对于俄国革命感到相当的失望”，即使写了一些“对苏联共产充满溢词的文章”，也“并非出于理性”，是受了“迷惑”，为了“生存”。

瞿秋白在《晨报》所写的通讯中，既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又对苏俄人民能够克服困难而充满信心。他说：“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她是在“腐旧蚀败的根里”，“突然挺生”出的新嫩鲜绿的嫩芽，她的生命是不会摧折的，因为“春意的内力”充满宇宙，“勇猛精进抗御万难，一往不返”。她是人类社会的“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④。

瞿秋白在歌颂十月革命意义的同时，对当时俄国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并不回避。他如实地写道：那时的苏俄“经连年战乱……元气亏耗，病根还没有全去”，“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⑤，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在时时觊觎着它，国内阶级敌人也在时思复辟，而国民经济尚处在恢复期中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对待这些，革命政府“设种种方法力图救济”，俄国共产党“并没有灰心丧气”，进行着“坚忍斗争”。这种努力“证明工人阶级中蕴藏有源源不绝的力量，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享有无限伟大的威信”。他指出，尽管此时“春意还隐于万重凝雾”，然而却“可以静待灿烂壮严之将来”。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瞿秋白的远见卓识与务实精神相结合的理性主义的思想光辉。

二

司马璐武断说，瞿秋白是一个“自由派的共产党人”。他“在思想上早已做了共产党的逃兵”，“他身上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子，有释迦牟尼的影子，但却什么都不是”。在行动上，瞿秋白“始终是一个调和主义者”。在思想意识上，瞿秋白苦于重感情、重道义的气质，使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标准的布尔雪维克”。

在瞿秋白的一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他在《多余的话》中再次宣告：“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二十一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在狱中，敌人企图利用中国革命暂时受到挫折的处境，动摇瞿秋白的信念。敌36师参谋长向贤矩问他：“依先生之见，中国的前途如何呢？”瞿秋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只要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瞿秋白在牺牲前曾说过：“如果有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他看来，有的人虽生犹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有一个不死的

①②③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50、91、87页。

④⑤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5页，第132页。

灵魂，与宇宙同存。而瞿秋白虽死犹生，虽然他明知肉体即将被敌人消灭，但做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动摇，让“灵魂”永存。

毋庸讳忌，出身于没落士大夫家庭的瞿秋白，在青少年时代，对于人生的道路，有过各种探索，在求索过程中，受过各种思潮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有过曲折复杂的变化。瞿秋白早期思想中，虽然潜伏着民主主义的激流，但作为一个求索者，他当时还不曾有确定的哲学观众，在思考与探索人生道路，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时，受到唯心主义的影响。他曾求助于佛学和老庄，倾向于“避世”“厌世”，希望在书斋内“冥想”人生的“奇秘”，时而“有就菩萨行为而佛教人间化的愿心”，时而又立志“以文化救中国”^①。然而，冷酷的现实所给予他的答案却是愈加黑暗和丑恶。他痛苦到了极点，只有悒郁陪伴着他。他十八岁时，写了如下诗篇：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调子是消极的、愁苦的、颓唐的。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赴十月革命故乡的考察，使他在实践中不断批判了“旧我”，终于由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公开宣称“‘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活泼稚儿”“我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②。

司马璐运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全盘抹杀瞿秋白从“就菩萨行为而佛教人间化”到主张“共产主义人间化”的历史性转变，别有用心地说瞿秋白“‘参加革命’的动机，是有‘沽酒长安市’之意的”。众所周知，瞿秋白的上述诗词是作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瞿秋白在该诗后附加了自我批判的跋言。他说“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③司马璐移花接木，把瞿秋白的“隔世”之作、反映“旧我”时代“忏悔贵族”的“颓唐气息”的作品，偷梁换柱，作为瞿秋白“新我”时代的人生观，妄图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这难道是“不存偏见”吗？

司马璐还列举了一大堆“史实”，证明瞿秋白是个“调和主义者”。他说瞿秋白在中共“五大”上，搞“调和主义”，“帮他（笔者按：指陈独秀），过了关”；

“八七会议”上，他对陈独秀“神经紧张，气馁胆怯”，“战战兢兢的”；

“八七”会议后，暴动失败，他“代人受过”，“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六届三中全会”，他对“立三路线”和“李立三个人采取了同情和调和的立场。”

……

对上述言论，我们并不陌生，说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气馁胆怯”的言论，是出自共产党的叛徒李昂的《红色舞台》，而完全抹杀瞿秋白领导下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说瞿秋白对李立三错误完全采取“调和主义”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司马璐熔这些人的观点于一炉，锻造出攻击瞿秋白的罪恶子弹。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的原则问题上，无论对己、对人，党内、党外，都是严格的。他观点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2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65、166页。

③ 《瞿秋白诗文选》，第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鲜明、立场坚定，从不折衷调和。在党外，他对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戴季陶主义、第三种人、国民党改组派、人权派和托陈取消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党内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一九二七年初，瞿秋白对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公开化。二月初开始撰写《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四月下旬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这本小册子，系统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他针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大声宣告：“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杜洛茨基主义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之雏形。”“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胜利！”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召开了党中央紧急会议，瞿秋白和任弼时等人进一步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坚决纠正和彻底地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从而“使党大进了一步”^①。瞿秋白的这些言行，是对诬蔑他对陈独秀搞“调和主义”的司马璐的有力的驳斥，世界上哪有对着陈独秀的面说“我可不怕”“斩首制度”的“调和主义”！哪有“我服从马列主义的纪律”的“折衷主义”！哪有坚决撤换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气馁胆怯”！

一九三〇年七月，瞿秋白与周恩来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和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件事的处理是正确的，但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支持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把瞿秋白对李立三错误的处理完全说成是“调和主义”，并把秋白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司马璐在三十二年后，重弹王明的老调，实在可悲！

瞿秋白在开展党内斗争时，既有原则性，但又对犯错误的人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对大革命时期党内机会主义问题，首先应由陈独秀负责，但是，责任不是陈独秀一人的，“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他在严肃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和分清责任后，对陈本人已往的历史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指出“从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以后，他对李立三采取了同样的分析态度。这种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立场，反映了一个走向成熟的革命家所应有的襟怀与气度。但是司马璐却说这是瞿秋白“重感情，重道义”的“自由派的共产党人”，“不是布尔雪维克型的政治动物”的明证，完全颠倒是非。

三

司马璐的《瞿秋白传》，其捏造事实，篡改史料的地方很多，现择其要者，剖析四点。

司马璐诽谤鲁迅与瞿秋白的革命友谊。他说瞿秋白与鲁迅之间“互相可用之处甚多”，瞿秋白以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是存心‘制造’鲁迅”，是“欺世盗名”。瞿秋白“视鲁迅为‘知己’与‘同怀’其心境凄凉可知”。在这里，司马璐用市俗的眼光把鲁迅与瞿秋白的革命情谊看作是“互相利用”“知恩必报”的庸俗关系。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与瞿秋白见面时，一个已是著名的共产党的理论家、宣传家，一个是早已蜚声中外文坛的革命作家，他们的声誉、名望，是长期从事革命事业所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

得的，早已为社会所公认，不需要相互去“制造”。而他们俩人的友谊是建筑在“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共同基础之上的，是在共同领导文化战线反“围剿”的战斗中凝成的。早在一九三一年瞿秋白与鲁迅尚未见面时，就已经通过书信往来建立了亲密关系。一九三二年夏，二人见面后，就并肩战斗在文化战线上，共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曲的解放》、《迎头经》等十余篇杂文，当时由于国民党到处缉捕瞿秋白，他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有困难，为了及时参加战斗，他用了鲁迅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等刊物上登载。所以杨之华说得好：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只有集体主义代替了个人主义，只有人民大众的利益代替了个人利益的时候，才能打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人相轻的恶劣传统”，“他们的友谊不是建立在个人生活上，而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建立在党和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事业和共同品质的基础上。”^①

司马璐为了丑化鲁迅和瞿秋白的关系，竟置最起码的历史常识于不顾，把当时鲁迅化名洛文书赠瞿秋白（化名疑欠）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反客为主，说成是瞿秋白（署名洛文）“送给鲁迅”的“一副立轴”^②。并板着一付面孔指责瞿秋白：一个共产党员的一切必须属于党的组织，怎么可以“得一知己足矣！”“其心境凄凉可知”。鲁迅把瞿秋白当作“知己”，不仅表达了他对秋白的崇敬、信任的心情，而且深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热爱与期待。瞿秋白“以同怀视之”，是为了党的事业，团结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伟大旗手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共同奋斗，这是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象征，对此，只有司马璐才感到“心境凄凉”！

司马璐荒谬地说：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瞿秋白到苏区受到“排斥”，“有职无权”，“带着一群男女孩子排戏”。事实是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继续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部长、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隶属的艺术局，负责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务工作。四月，在他主持下，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公布了二十四条有关教育工作的法规，明令规定苏区的教育应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和生产运动服务。在瞿秋白的努力下，健全了苏区的文教组织，开办了各种类型学校，从扫盲到培训师资及干部，直接领导了苏区文化艺术工作，特别是戏剧活动。为苏区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很难想象这些成绩是在瞿秋白“有职无权”的状况下取得的。

司马璐恶毒地挑拨造谣说，中央红军长征，组织决定瞿秋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是“一个谋杀瞿秋白的行为”。瞿秋白在突围时被捕，“是否与谋杀瞿秋白有关？”瞿秋白被捕后，中共中央命令当地红军“实行军事劫狱，如不能救到活的，就设法把他弄死。”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诽谤！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当时身患严重肺病的瞿秋白，由于健康等原因不能随军长征。他与项英、陈毅等一起留在苏区，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肺病更加严重，中央分局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为了他的安全与治病，于一九三五年初决定送他转道香港赴上海就医。

二月二十一日，何叔衡、邓子恢和瞿秋白一行开始突围，二十四日拂晓受到敌人伏击，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由于连续不断的奔跑，精疲力竭。据邓子恢回忆：“我又去叫瞿秋

^①见杨之华《瞿秋白和鲁迅》，《人民日报》1949年6月16日。

^②司马璐：《瞿秋白传》，第87页。

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边打边走……向闽西走去……^①。

瞿秋白被捕后，说中共中央下令劫狱不成，“就把他弄死”的谎言，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人员陈不旧的《瞿秋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造谣诽谤是国民党特务的本能，而传布流言则是一切反共文人的惯用手法。他们共同信奉的是戈培尔的“造谣千次，就成为真理”的哲学。但谎言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只能暴露制造流言者的可耻面目。

司马璐还说瞿秋白“临刑时”“绝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高呼‘打倒’‘拥护’之类的口号”。瞿秋白从容就义，决不是共产党所“宣传出来”的，而是客观事实。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第四版登载的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导：瞿秋白来到公园，“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此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临场监刑的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光晷原是留俄学生，他当时清楚地听到瞿秋白用俄语唱“英特纳雄奈尔……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瞿秋白到达刑场后，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六岁。对瞿秋白的这种浩然正气，一切断了脊梁骨的反共政客，当然是无法理解的。

司马璐在历史上一度被国民党“制造过”，“他懂得‘制造’在政治上的重要”，所以他开了一个“制造”工厂，炮制出诸如《瞿秋白传》等反共作品来毒害青年。五十二年前，国民党特务赵庸夫利用瞿秋白的牺牲，编造谎言，要“一般执迷不悟的共产青年”“悔前恐后”。半个世纪后的今日，司马璐继承赵庸夫的衣钵，“制造”出一个假瞿秋白的形象，企图蒙骗革命青年。但历史证明赵庸夫的险恶用心挽救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花落”时代，而司马璐的行为同样不能使国民党的“春残”回光，广大革命青年矢志不渝地沿着瞿秋白所开辟的“光明之路”奋勇前进，为实现“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不息。革命青年将永远怀念他，秋白如九泉有知，一定会瞑目含笑的！

一九八七年二月

^① 见陈铁健：《最后的斗争》。

一点质疑

我国外国文学教材，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在论及莎士比亚创作时，一般都认为莎翁创作初期（1600年以前）正值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极盛时期，而中期（1600年以后）则是女王统治开始岌岌可危，社会矛盾尖锐，英国国力衰退之际，以此来划分莎翁戏剧创作的时期，并作为说明和界定莎翁早期之所以创作喜剧、历史剧，而中期之所以转向悲剧创作的唯一依据。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我们查阅一下英国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我们自己主观上制定出来的想当然的模式框框，而事实则不然。英国史上伊丽莎白时代是一个整体时代，不存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整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国力一直强盛不衰，社会基本安定繁荣，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她在位后期，不仅处死了代表天主教贵族利益而试图争夺王位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而且在1600年成立了掠夺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增强了国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深得资产阶级拥护。其执政末年，内外政策更加开明，反专制独裁倾向日甚，这都有利于以人文主义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英国史上从未把1600年作为划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前后两个时期的界线，不知以此来划分莎士比亚的创作时期，是否妥当？

（敏捷）